

(上接9版)

季风:您除过认真写作外,还有另一种才能是作书画,是否正是古人说的君子不器,一个人不能拘泥于一才一艺,而要通于艺,游于艺。您曾经在青年时期不幸患上乙肝,严重到有腹水,大家都以为得那种病治疗不好,但您后来真正康复了。有人问您这个问题,您都说是自己治好的,这种玩笑式的调侃是真是假?

贾平凹:我的书法、绘画和写作,对我来说是互补的。这种互补我知道它的好处。但文学对于我来说是第一的,为了保证这个第一,别的我都可以舍弃。从这点讲,书画算是余事。对待余事,我多少有些玩票的意思。虽然我的书画经常有人买,卖出几张得到的钱会比我写一部长篇的稿费还多,但若我正在写一部长篇,写到要紧处,谁来买书画我都会拒绝的。我甚至想搞书画能卖钱,是不是上天给我的一种补偿,因为写书是很难养家糊口的。也是我这种补偿的想法,使我虽然把搞书画当成余事,却不敢轻佻随意,越发要认真对待。

我们对待任何东西,都要有感恩的心。包括要善待自己身体的各个器官。我在晚上睡觉时,会感谢身体的每一个器官。在肝难受的时候,我会对肝说:你病了,却还要为我工作,你要忍着点啊;肝好点的时候,我会说谢谢你啊,你这么听话,我今天舒服多了。我每天和自己的肝说这说那,就像安慰另一个自己。当我关怀肝的时候,其实也是在关怀自己。就这样,我的肝病奇迹般地好转了。而我的那些病友,几乎都去世了。我现在基本上全好了。

季风:肝病确实是一种很厉害的传染病,以前陕西作家路遥也正是传染此病英年早逝的,您当时是什么样的经历,也很担心过自己的生命?

贾平凹:我是突然患了肝病,像当年的“四类分子”一样遭到歧视。不过我当时倒觉得活得极为清静,左邻右舍不因频繁来人敲我家的门声而难以午休,遇着可见可不见的人,很远抱拳招呼一下就敷衍了,领导再不让我为未请假一次又一次写检讨,长舌妇和长舌男也不用嘴凑在耳朵上说是非。遇到任何难缠的人和难缠的事,一句“我患了肝炎”,便是最好的遁词。但是,人毕竟是群居动物,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,不禁无限的孤独和寂寞。唯有妻子和女儿主动亲近,家庭没有开除我的家籍。家人越是待我亲近,我越是害怕传染给她们,我与她们分餐,有自己的脸盆、毛巾、碗筷、茶几,且各有固定的存放处。我只坐我的座椅,用脚开门关门,瞄着马桶的下泄口小便。她们不忍心我这样,我说:这不是个感情问题。我每夜烧两盘蚊香,使叮我血的蚊子不再去叮我的家人,我却被熏得头疼。我这样做的时候,心在悄悄滴泪,当她们用滚开的水烫我的衣物,用高压锅蒸或熏我的餐具,我觉得那烫的、蒸熏的是我的一颗灵魂。我盼望病能很快好起来,可惜当时吃过几篓中药、西药,全然无济于事。我平日是不吃荤的,喜食素菜,那些年里吃的草药,曾让我怀疑要变成牛和羊。说不定我前世就是牛羊所变的。

后来我住进了传染病院,像囚犯一样要穿病号服,并被限制行动在一个小院子里,院墙是铁制的栅栏。但我内心渴望自由,每天打过吊针后,就在院子里看红红的太阳,看涌动的云,努着嘴唇逗引栅栏外树上的小鸟。住院的人都是面色青黄,目光空洞,步履虚弱。看着他们的形象我也知道自己的模样。我那时是忌讳用镜子的。病人是互不歧视的,同监狱的区别正在这里,犯人是互相监督互相打小报告而争取减刑,因为他曾经“犯”过人,以犯人入狱,又以犯人减刑出狱。我们入院的一半是为了自己,也是为了不犯别人,所以互相关

心、体贴。每有一个病友出院,我们都欢欣庆贺他康复,也为了自己将来能治好而高兴。每有新病友入院,我们多半却为他被传染而悲伤。欢迎仪式虽不是握手、拥抱,却提醒他怎样买饭票,怎样服药,怎样不必悲观。病友和上学的校友感情一样,都很珍贵,我们在出院后,依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关系网。

季风:您怎么看待成功?您很早是闻名遐迩的大作家,很多人却喜欢您年轻时的作品,是否那时的作品质量高于现在?都觉得您在年轻的时期是最有激情、热情的,并有源源不绝的创造力。

贾平凹:我年轻时候的写作,是因为里面用一些平时摘录的幽默句子,到老了之后,不讲究这些东西,完全变成一种说话的东西,自己体会的东西更多了。年轻时生命体会的内容少,都是受别人的启发,受什么触动发一些感慨,也有无病呻吟,强说忧愁的东西。但老了之后说愁说苦,是用另一种形式、另一种语调把它写出来。

在别人眼里,我可能是成功了。其实在我自己的感觉里,或许只是成名了。别人知道你了,这可能就叫成名吧,但成名绝不等于成功。什么事情,你越钻进去,你越觉得自己确实微不足道。文学创作的突破比较难,像跳高一样,要突破,就像运动员极力提高纪录的那么一厘米、几厘米,太难了。所以一定要有创新,一定要往上突破,要么自己的读者也会抛弃自己的。

季风:您年轻时写过一篇类似誓言的文字,让自己发奋,并记录首次发表的处女作品及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经历,也讲述自己由山区到城市靠写作收获人生的艰难攀登。那时您就树立了当伟大作家的高远目标,并有不破楼兰不回头的劲头?

贾平凹:是的!上大学前,我还是个农民身份,平时穿一件父亲穿旧了的中山装。因为口笨,说不了机巧话,体力又小,在农业社挣工分时也没有村人喜欢与我一块干活。我被分派在妇女窝里劳动。妇女们的一天工值是八分,而我只有三分。在1972年5月份,我竟到西北大学读书了。第一次看见高大的金碧辉煌的钟楼时我几乎要吓昏了,背上的父母给用草绳捆的那床印花被褥老往下坠。我沿着墙根走,心里又激动又恐慌。去商店看见了香肠,不知道是什么,问服务员,遭到哄堂大笑。我尿急找不着厕所,走进一个单位办公楼上,看见有男厕所字样赶紧进去,却瞅见一排如立柜样摆设,吓得慌忙又退出来。这时有人进去了,一会儿那人系着裤带走出来,我疑惑地再进去。也是水火无情,逼得我一下拉开立柜的门,才发现正是大便池子。入学不久,老师要求新生写一篇入校感想,我作了一首诗,三天后那期校刊出版,上边净是教师们的诗文,作为学生写的,只有我的那首诗。我一下子后腰骨硬硬的,心里豪情地说:诗这玩意儿,挺好弄。

那时但凡对我有一字指点,我便甘心要三生报恩不忘记。有次与同学骑自行车找一个诗人指导,俩人边骑边讨论,过十字路口竟忘了躲避,结果连人带车被交警扣住,交警处理要么罚款十五元,要么没收自行车。我俩眼泪汪汪。对一个穷学生来说,罚款十五元谈何容易,自行车也还是借来的,在大雪地里,我无奈去附近商店讨了一张包装纸,买了支铅笔,趴在马路上写检讨,把罪恶全给自己戴上,也把世界上最求饶的语言连接上。五个小时后,交警终于感动了,自行车也被要回来了。那次没有得到指点,却由此怕交警,上班骑车骑到十字路口,总先老远就下来推着车走。

(下转11版)



陈忠实、路遥、贾平凹、白描等人在榆林毛乌素沙漠



贾平凹在僻静的地方专注看稿



贾平凹坐在老家的门槛上歇息



贾平凹在老家和乡亲们亲热地交流